

海上学府交流小结

2020-10-08 20:22:54

《SP20世上最惨一届SAS：一名SASer不可复制的故事》哲学学院本科生 颜某某“乘坐一艘德式游船，和五百多位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年学子共同游学世界。”对海上学府的描述一下子就抓住了我的兴趣。于是，我放弃了申报更加学术的交流项目，想着一定要在本科四年里来一场最为特殊的交流。这个愿望的确实实现了，但没想到最后“特殊”一词的含义会如此复杂。半年后，我写下这段交流小结，以期让后来的SASer们在享受暴风雨和颠簸、夕阳和海鸥，像海豹一样躺在甲板长凳上晒太阳之余，还能知道之前的旅人在同一艘船上经历了怎样的故事。

1. 申请之路一波三折：2019年的新春，河南商丘。我和我的实践小组组员正聚在宾馆房间内规划明日行程，微信传来的一阵激烈震动突然打乱了讨论节奏，也打乱了我对大三上学期的规划——甚至说得夸张点，直接打乱了我个人生涯中的数年规划。Mary告诉我和丹妮，CYtung奖学金只能在春季，即2020SP提供了，这意味着我还得在复旦度过大三上（显然当时的我根本意识不到这对我之后之年意味着什么）。当然，Mary为我们提供了同一学期换项目的方案。考虑到其余项目无法和海上学府比拟，我们都选择了赌一把，将19FA的项目推迟到了来年——这条航线主要走东南亚和非洲国家。鉴于研究生应该会去欧洲交流，20SP的航线对我来说比主打欧洲沿海国家的19FA更具有吸引力。然而，20SP的申请却遇到了更大的挫折。由于各方信息协调的不当，我和丹妮差点无法获得奖学金，甚至无法获得参加SAS的资格。得知该消息的我彻夜未眠，心中郁闷难纾：“怎么别人的项目顺风顺水，就这个海上学府整这么多幺蛾子呢？”好在经过靠谱Mary的反复催逼，我和丹妮都整到了上船名额。当时的我认为项目申请过程中的波折大概相当于阿伽门农祭献女儿保平安，想来奖学金分配到手了，一切都会顺利了。谁能料想这还仅仅是个开始。不过回过头来想，上船前的波折磨练了我们的心性，使得我们对整个项目可能具有的不稳定性早有精神上的准备。这也使得后来事发时，我们能比大多数西方学生淡定。跑签证过程也是够劳神费力的。为了办签证，我不得不和《伦理学原著选读》的罗亚玲老师请了两次课，翘了一节西马课与讨论课，甚至在周末坐高铁去北京办加纳签证。跑点过程中也办了蠢事——和面瘫男低音的加纳签证官交流低效，以至于最后申请“半年”的签证签发成了“三个月”成了废纸一张；由于时间来不及，所以以电子方式申请的印度签证，眼残签成了一年。一轮磕磕碰碰下来，我恐怕是比多数同龄人要深谙签证行当的门道。期末，考完最后一门西马便穿着红色冲锋衣冲上了征程，活像是当年意气风发出征西西里的雅典青年军，对前路荆棘坎坷一无所知。

2. 在奥德赛上演《奥德赛》：《奥德赛》记载特洛伊战争结束后奥得修斯历经坎坷终于成功归乡的故事。这一文学作品的名字被用来命名我们的船只，估计取奥德赛在地中海四处漂流“用于探索”之意。诚然，在船上的不少经历是具有真正具有探索性的——第一次参加即兴JAM、迎着海风吹《泰坦尼克号》；在寝室里呆着突然被四个小伙伴叫出去，环绕着我跳着诡异的舞蹈并被奉为新宗教领袖；在船上创设一个烂尾的Kungfu Club；晚饭后在甲板上目睹陆地上绝不能见到的夕阳入海；在进餐时瞥到飞跃出海面的飞鱼或海豚；在日本试图顶着疾风大雨徒步走上六甲山；在南非，于缆车关闭身体抱恙的情况下爬桌山，临近山顶严重缺水，夜晚下山时则面临因视野不佳而跌落的陷阱……这些或惊喜或惊险的经历想必是之后的SASer们都会获得的经验，便无需在此铺陈了。在我的经历中真正值得叙说的，是如何在“奥德赛”号上生动演绎了《奥德赛》的核心主题——归乡。由于疫情的关系，中国学生不得不过家门而不入。在临近日本之前，国内日益得到重视的新冠疫情开始得到SAS方的重视；抵达日本后第一天，我们就得到邮件称不能如期前往上海；在日本第二天，当我刚从热气腾腾的温泉出浴时，打开手机就看到国内确诊数量翻倍的噩耗……SAS方决定，将在越南做长期停留12天，以弥补在中国损失的天数。船上开始出现零零散散地忧虑言论，但总体上，美国学生绝不会有中国学生那么忧虑——毕竟那时危机还没有降临自由美利坚。如果说在日本期间，疫情对中国学生的影响还是间接的；那么从船只离开日本开始，疫情则直接地影响了这艘船上的三位大陆学生。首先是船长通知我们，马来西亚拒绝中国人入境（而这一消息却与马来官方消息不合）；其次是越南政府拒绝了我们入境。越南政府或许一方面不自信自己防控疫情的能力，且无过多基层资源来专门确认每一个中国大陆旅客是否在过去14天内处于中国；另一方面出于对中国的历史宿怨，采取了一刀切政策，拒绝所有中国大陆护照旅客入境——而我们在船只沿着湄公河驶入胡志明市后，当天早上才突然被告知了这一消息！然而，或许是因为经历了过多的变故，而中国学生又的确更有“大局观”，中国学生以远远超乎船老大（Deans）预期的乐观态度接受了这一事实并开始试图自我拯救。在船只停留的前几天内，我们可能写了这辈子最多的给中国驻外使馆的邮件，给外交部打了最多的电话，但却仍然无所收获。其他国家的学生和老师们很同情我们，给我们捎了不少纪念品和零食，让我们享受到了一把被投喂的快乐。船老大甚至给了我们不少特权：无限制流量、定制蛋糕、与船长共进晚餐、在小教室看电影……同学和管理层的帮助无疑让我们的豪华监狱生活变得不那么无聊了。实话实说，那十二天过得挺滋润，我利用这段时期读完了《小逻辑》，开始逐渐适应船上的自学节奏。但是，来自管理层的帮助并不是完全出于同情与慈善的动机的。我们能感觉到，船长与管理层有为了全船之后航行顺利考虑，劝说我们在马来或越南以特殊途径归国的意思。我们曾经花了数个深夜聚在一起分析利弊得失，决定是否要在马来坐飞机回国（这一选项也向部分希望退出项目的外国学生开放了）。其中纠结与争辩难以言说，最终，我们选择留下来，看看这趟旅程究竟还能怎样变化。于是乎，我们错过了在越南和马来归乡的契机。但从马来以后，归乡问题就不仅仅是中国学生的问题了，而变成了全船的问题。塞舌尔拒绝了船只入境，使得去留问题一度成为了全船为之焦虑的问题；随后，由于没有申根签证，部分学生（包括中国学生）又被告知可能必须在南非提前结束项目；最后，随着美国国内疫情日益严重，美国官方下令停止一切美属船只活动，全船被迫在南非终止项目，提前回国。回国时，我自己又在深圳经历了一些小意外和波折，在此便不便多言了。

3. 世上最惨的和最幸运的：我想，说SP20的SASer是世上最惨一届SASer是毋庸置疑的，当年的索马里海盗和埃博拉病毒，据管理层所说，也没能对整个行程产生如此大的影响。但是，越惨的经历，也是越独特的经历。或许几十年后，当我的后代问到历史课本上2020年的大流行事件时，我还能作为一个亲历者，添油加醋地从独特视角为TA叙说一个传奇故事。我想，这比大多数只能描绘自己旅游经历的SASer要更加难得珍贵。对我个人而言，从变更行程到提前回国的一系列意外，对我却是最宝贵的契机。如果没能变更行程，我就不能选择我导师开设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程，不可能以这个方向为研究生方向，更不可能联络到我目前的导师；而如果没能提前回国，用更多地时间准备论文、阅读文献，我就很有可能落选卓博计划。我失去了预期中的海上游学之旅，却开启了不可料想的人生新征程——“奥德赛”号它停了；但《奥德修斯》仍在被书写。